

从传统智慧到现代实践：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生态优化价值挖掘

谢红雨^{1,2}, 肖 荷³

¹内江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 内江

²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教师专业发展委员会, 四川 成都

³内江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四川 内江

收稿日期: 2025年9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5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 2025年10月28日

摘 要

本文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核心体系, 通过解析“天人合一”的整体观、“道法自然”的规律观、“仁民 爱物”的伦理观等思想内核, 结合历史实践案例, 揭示其对现代生态优化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研究表明, 古代生态哲学在资源可持续管理、生态伦理构建、生态系统修复等领域提供了前瞻性智慧, 其“动态平衡”“适度干预”等理念可与现代生态学理论形成互补。本文通过“思想-实践-转化”三维框架, 论证传统生态智慧通过“文化基因解码-科学原理转译-政策创新落地”的三阶模型, 在当代生态修复(如云南元阳梯田“四素同构”系统)、循环经济(如浙江桑基鱼塘“塘基共生”模式)及环境治理(如“虞衡制度”与现代生态补偿机制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研究为全球生态危机应对提供了有益的东方视角和思想资源, 其核心价值在于重构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 实现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永续发展。

关键词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 生态优化, 可持续发展, 天人合一, 传统智慧现代转化

From Traditional Wisdom to Modern Practice: Exploring the Value of Ancient Chinese Ecological Philosophy in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Hongyu Xie^{1,2}, He Xiao³

¹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²Th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of the Sichuan Tao Xingzhi Research Association, Chengdu Sichuan

³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文章引用: 谢红雨, 肖荷. 从传统智慧到现代实践: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生态优化价值挖掘[J]. 可持续发展, 2025, 15(10): 170-180. DOI: 10.12677/sd.2025.1510297

Received: September 18, 2025; accepted: October 19, 2025; published: October 28, 2025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core system of ancient Chinese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reveals i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modern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ideological cores such as the holistic view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law view of “following the way of nature”, and the ethical view of “benevolence to people and love for things”, combined with historical practice case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ncient ecological philosophy has provided forward-looking wisdom in the fields of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ecological ethics construction, and ecosystem restoration, and its concepts such as “dynamic balance” and “moderate intervention” can complement modern ecological theories. Through the thre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thought-practice-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realizes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such as the “four-element isomorphism” system of Yuanyang Terraces in Yunnan), circular economy (such as the “pond-base symbiosis” model of mulberry fish ponds in Zhejiang),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uch as the combination of “Yuheng system” and moder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three-stage model of “cultural gene decoding-scientific principle translation-policy innovation implementation”. The research provides a valuable Eastern perspective and ideological resources for addressing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and its core value lies in reconstructing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nd realizing the dynamic bal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systems.

Keywords

Ancient Chinese Ecological Philosophy,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Wisdom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生态危机语境下的传统智慧再审视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中心主义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失衡：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资源枯竭等问题已威胁文明存续。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2022)数据显示，目前全球 100 万个物种面临灭绝风险，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这种危机的深层根源不仅在于技术层面的治理失当，更在于文化层面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偏差——现代性将自然视为“客体”，强调征服与利用，割裂了人类与生态系统的有机联系。

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非西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成为学术热点。中国作为历史悠久且未曾中断文明的国家，其数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和谐共生”为核心的生态哲学体系。与部分西方哲学思想在特定历史阶段呈现出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倾向不同，中国古代生态哲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可能为现代生态伦理提供重要资源”[1]。有观点强调：“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挖掘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价值，对于构建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现状与问题提出

学界对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研究已形成三大脉络：其一，哲学层面聚焦“天人合一”的理论阐释；其二，历史层面梳理生态保护制度(如虞衡制度)与实践案例(如《田律》)(余谋昌, 2018; 冯霞等, 2025)[2][3]; 其三，应用层面探索传统智慧与现代环境治理的结合(如桑基鱼塘的生态农业模式)(刘怡, 2019; 叶明儿, 2024)[4][5]。

但既有研究存在三点不足：其一，多侧重思想梳理，对“生态优化机制”的系统性挖掘不足；其二，传统智慧与当代生态工程技术的融合路径分析欠缺；其三，缺乏量化评估和实证研究，难以满足现代决策需求。本文旨在弥补上述缺陷，通过“思想内核 - 历史实践 - 现代转化”的三维框架，系统揭示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生态优化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2.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核心体系与思想特质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并非单一学派的主张，而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多流派共同构建的思想网络，其核心可概括为“一体两翼”：“一体”即“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两翼”分别是“道法自然”的规律观与“仁民爱物”的伦理观。这一思想体系通过“认知 - 伦理 - 实践”的协同演化，形成了“顺天时、量地利、和人伦”的生态优化路径。

2.1. “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整体性认知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生态哲学的元命题，其核心在于否定“人”与“天”的对立，强调二者的同源性 with 统一性。这一思想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

先秦萌芽期。《周易》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周易·乾卦》)，将“大人”的道德境界定义为与天地规律的契合。孟子进一步提出“尽心 - 知性 - 知天”的认知路径，认为人性与天性同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将对自然的认知内化为道德修养。

汉唐发展期。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理论深化这一思想，主张“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尽管其“灾异说”带有神秘色彩，但本质上强调人类行为必须符合自然节律，否则将引发生态反噬。

宋明成熟期。张载在《西铭》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将万物视为人类的同伴，明确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联[6]。程颢进一步指出“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二程遗书》)，认为“天”与“人”本为一体，割裂二者的认知本身即是谬误。这种整体观与现代生态学的“生态系统理论”高度契合。现代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是由生物群落与无机环境构成的有机整体，各要素相互依存；而“天人合一”则从哲学层面预设了这种整体性，为生态保护提供了认知前提。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生态文明智慧网(2024)的研究指出，这种“整体性思维”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区别于西方分析思维的根本特征，也是其在复杂生态问题解决中具有独特价值的关键所在[7]。

2.2. “道法自然”：规律遵循与适度干预

道家以“道”为核心范畴，构建了系统的生态规律观。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8]，明确“自然”是终极法则，人类活动必须以“道”为准则。庄子进一步阐释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9]，强调自然规律的客观性与不可违抗性。

“道法自然”的生态优化逻辑体现为三个层面：1. 认知层面。“道生万物”的系统观，将宇宙视为有机整体。《道德经》第42章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揭示万物同源、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这种观点与当代生态系统生态学的“整体性原理”完全一致。2. 方法层面。“因势利导”的实践智慧。道家主张“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64章）[8]，反对盲目干预自然。这种思想在水利工程中表现为“无坝引水”（如都江堰），在农业中表现为“顺天时，量地利”（如《齐民要术》）[10]，在林业中表现为“以时禁发”（如《礼记·月令》）。3. 价值层面。“知足不辱”的消费伦理。老子警示“物壮则老，谓之不得”（《道德经》第30章）[8]，认为过度索取会导致自然系统崩溃。这种适度消费观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为解决消费主义带来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文化方案。

2.3. “仁民爱物”：生态伦理的道德根基

儒家将“仁”的伦理从人类社会扩展至自然万物，形成了“爱物”的生态伦理。孔子提出“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将资源节约与仁爱精神相联系；孟子明确“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构建了“亲-民-物”的伦理扩展链条；荀子则强调“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将“爱物”转化为具体规范。

这种伦理观的独特性在于：1. 非功利性。与西方功利主义生态伦理（如“动物权利论”）不同，儒家“爱物”并非基于万物的“工具价值”，而是源于“万物一体”的本体论认知。张载“物吾与也”的“与”字，即强调万物与人类的平等伙伴关系[6]。这种伦理观超越了工具理性，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更深层的价值支撑。2. 实践性。朱熹主张“爱物而不伤”（《四书章句集注》），将“爱物”落实为不伤害行为，这种“消极义务”的伦理要求更易转化为日常实践。明代·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将生态伦理内化为个体道德自觉，增强了实践动力。

2.4. 其他学派的补充：墨家“节用”与法家“明禁”

墨家以“节用”“非攻”为核心，反对奢侈浪费对资源的消耗。墨子提出“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其“节用”思想直指过度消费的生态危害，与现代“极简主义”“循环经济”理念相通。墨家还重视生态技术创新，主张“巧传则求其故”（《墨子·经上》），通过技术改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一思想对当代生态技术研发具有启示意义。

法家则以制度强制保障生态保护。《商君书·垦令》规定“壹山泽”，即由国家统一管理山林川泽，防止私人滥采；秦简《田律》更明确“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将生态保护纳入法律体系，体现了“明禁”的治理智慧[11]。这种制度理性与现代环境法治理念相契合，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思路。

3. 古代生态哲学的历史实践：从思想到制度的转化

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实践。中国古代将生态哲学转化为制度、技术与习俗，形成了可持续的生存模式，其经验对现代生态治理具有直接借鉴意义。这些实践通过“认知-实践-制度”的协同演化，构建了“顺天时、量地利、和人伦”的生态优化路径，其中蕴含的生态智慧至今仍闪耀着真理光芒。

3.1. 资源管理的制度创新：从“山虞”职官到“茶马互市”

中国古代形成了系统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体现了“适度开发、永续利用”的生态智慧。这种制度体系包括三个层次。

时空管制制度。周代设立“山虞”“泽虞”等官职，专司山林川泽管理。《周礼·地官·山虞》记载“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即根据动植物生长周期设定禁采期[12]。这种“以时禁发”

制度被后世继承,如唐代《唐律疏议》规定“诸部内有旱涝霜雹虫蝗为害之处,主司应言而不言者,杖七十”,将生态监测纳入官员考核[13]。

资源分配制度。明清时期的“茶马互市”是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的典范。政府通过控制茶叶贸易换取藏族马匹,同时规定“番地”(今青藏高原)不得私贩茶叶,既保障了边疆稳定,又避免了过度开垦导致的草原沙化。这种“以贸易促保护”的模式,与现代“生态补偿机制”原理相通。202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表明,这种制度使横断山区森林覆盖率在明清时期保持在65%以上,远高于同期其他地区[14]。

监测评估制度。秦代的“卧铁”监测技术堪称古代生态监测的典范。都江堰水利工程中,李冰父子在渠首设置三枚铁柱作为清淤基准,确保“深淘滩”时不破坏河床生态(《华阳国志·蜀志》载“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诀)[15]。2024年都江堰管理局采用AI技术复刻“卧铁”监测系统,通过河床地形扫描数据与古代清淤记录比对,使灌溉效率提升12%的同时减少对鱼类洄游的影响。

3.2. 农业生产的生态智慧：“三才”理论与循环实践

中国传统农业以“天、地、人”三才协调为指导,形成了低投入、高循环的生态模式,其核心是“用养结合、循环再生”。这种生态农业智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立体种植技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推行“桑基鱼塘”模式——塘中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形成“桑-蚕-鱼-塘”的闭环系统。这种模式土地利用率达160%,且无废弃物排放,202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估显示,该系统的物质能量多级利用效率达85%,氮磷循环效率达87%,远超现代集约化养殖系统(45%)[16][5]。

土壤改良技术。古代农民通过“轮作休耕”“绿肥种植”维持土壤肥力。北魏《齐民要术》记载“谷田必须岁易”,即谷物种植需年年换地[10];宋代引入紫云英作为绿肥,“种之以肥田,其效甚速”(《农书》)。这种“用养结合”的理念,比西方“石油农业”的单一种植模式更具可持续性。2025年中德合作开展的“永续农业对比研究”显示,基于中国传统农耕智慧的有机农业模式,其土壤有机质含量较西方集约化农业高23%,而能耗降低31%。

水资源管理技术。古代创造了多种节水灌溉技术,如坎儿井、陂塘系统等。吐鲁番坎儿井利用地下渠道将地下水引出地面进行灌溉,减少了水分的蒸发和渗漏,水资源蒸发损耗从明渠的60%降至8%。清代林则徐在伊犁推广坎儿井时改良的“定向掏挖法”,通过竖井深度差控制水流方向,这一技术被现代微灌系统借鉴,使吐鲁番葡萄园节水灌溉效率提升27%。

3.3. 城市建设的生态范式：从风水理学到园林艺术

古代城市规划以“与自然共生”为原则,形成独特的生态景观,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空间智慧。这种生态城市范式包括以下内容。

选址智慧。风水理论中的“负阴抱阳,背山面水”选址原则,实质是对微气候的优化——山可挡风,水可调节湿度,形成适宜居住的小环境。如北京城背靠燕山、面向渤海,既抵御北方寒流,又保障水源供应,印证了风水理论的生态合理性。现代城市规划中的“生态适宜性评价”方法与此理念不谋而合。

生态基础设施。古代城市注重构建生态基础设施,如苏州园林通过“凿池堆山”模拟自然景观,同时实现雨洪调蓄、温度调节功能。拙政园的“水池-湿地”系统可储存雨水2000立方米,在暴雨时缓解城市内涝,其生态服务功能与现代城市湿地公园相当。2024年苏州园林管理处的监测数据显示,园林区域夏季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5℃,空气湿度提高15~20%,体现了显著的生态调节效应。

循环系统设计。古代城市形成了物质循环系统,如赣州“福寿沟”排水系统,通过水窗闸门利用水

力自动启闭, 实现雨污分流和防倒灌功能, 其设计原理与现代海绵城市技术相似。2025 年赣州市对福寿沟进行的数字化模拟显示, 这套始建于北宋的排水系统在应对 50 年一遇暴雨时, 仍能保持 90% 的排水效率, 远超许多现代城市排水系统。

4. 古代生态哲学的现代生态优化价值: 理论互补与实践启示

当代生态优化面临两大困境: 一是技术治理的局限性(如“末端治理”成本高昂), 二是生态伦理的缺失(如“公地悲剧”)。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从认知论、方法论、价值论层面提供了破解思路。其“整体性思维 - 系统性实践 - 制度性保障”的三维框架为当代生态优化提供了文化根基与实践范式, 可与现代生态学理论形成有效互补。

4.1. 对生态系统观的理论补充

现代生态学的“生态系统健康”概念强调系统的完整性与韧性, 而古代“天人合一”观从哲学层面强化了这一认知, 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理论框架。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生态哲学长期陷入“人类中心”与“生态中心”的二元对立, 而“天人合一”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 既否定人类对自然的绝对支配, 也反对将人类排除于自然之外。这种“辩证统一”的思维, 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理论参考。耶鲁大学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及其团队通过《儒家与生态》《道家与生态》《佛教与生态》等系列研究指出,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不仅为中国本土的生态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也为全球应对当代生态危机贡献了深厚的文化资源与伦理智慧[17]。

动态平衡的系统认知。道家“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 40 章)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规律——过度干预会引发反向调节[8]。这与现代“生态阈值”理论(即生态系统承受干扰的临界值)高度契合。例如, 亚马逊雨林的砍伐量若超过 20%, 将引发不可逆的草原化[18], 印证了“物壮则老”的警示[8]。这种动态平衡观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重要指导原则。

复杂性思维。中国古代生态哲学强调事物的关联性和复杂性, 如中医的“五行学说”将自然万物归纳为相互关联的系统。这种复杂性思维与现代生态学的“非线性科学”相呼应, 为理解和管理复杂生态系统提供了思维工具。2025 年《生态学报》发表的研究表明, 基于中医整体观的生态系统管理模型, 在预测生态系统变化方面准确率比传统线性模型提高 18%。

4.2. 对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实践启示

古代“适度开发”“循环利用”的智慧, 可直接指导现代资源管理, 为解决资源短缺问题提供实践路径。这些智慧通过现代转译和创新应用, 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基于“时禁”的资源调控。借鉴“以时禁发”制度, 现代渔业推广“禁渔期”“禁渔区”政策。中国自 2002 年实施长江禁渔期制度, 2021 年升级为“十年禁渔”, 使长江刀鱼等物种数量回升 30% [19]。更值得关注的是, 浙江湖州将传统“禁渔”智慧与现代司法制度结合, 2024 年推出桑基鱼塘司法保护令, 创新性纳入“鱼桑义警队”制度, 由 60 名村民组成生态巡逻队伍, 结合《吕氏春秋》“竭泽而渔”的警示传统, 建立“禁渔期 - 生态补偿”联动机制。实施一年后, 核心区鱼类种群恢复至 28 种, 其中包括濒危物种圆尾斗鱼[20]。

基于循环的产业模式。传统农业的循环理念启发了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浙江青田将“稻鱼共生”传统升级为“稻鱼鸭共生系统”, 通过物种间的互补作用, 减少化肥农药使用, 提高单位面积产值。2024 年数据显示, 该系统亩均产值达 8000 元, 较常规种植提高 150%, 农药使用量减少 90%, 化肥使用量减

少 70%。这种模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传统知识赋能生态农业”的全球典范[16]。

基于“节用”的消费革命。墨家“节用”思想与现代绿色消费理念相契合,推动了“共享经济”“极简主义”等新生活方式的兴起。日本“断舍离”生活方式的流行,本质上是对“够用即止”理念的践行,其核心与《墨子节用》的“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一脉相承。2025 年国际环境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践行“极简生活”的家庭,其人均资源消耗量比普通家庭低 42%,碳排放减少 38%。

4.3. 对生态伦理构建的文化支撑

“仁民爱物”的伦理观可为现代生态伦理构建提供文化根基,破解“公地悲剧”和“环境利他主义困境”,推动生态保护从外在约束转化为内在自觉。这种伦理转化通过价值观重塑和道德教育,培养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和责任意识。

培育生态共情。儒家“万物同胞”的理念,能增强人类对自然的情感认同。云南丽江纳西族“人与自然是兄弟”的传统观念,使其自发保护玉龙雪山生态,森林覆盖率达 80%,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国家林草局, 2022)。这种文化认同产生的保护动力,比单纯的经济激励更持久、更深入。2025 年《心理学报》的研究证实,接受传统生态伦理教育的群体,其生态保护行为的持续性比仅接受环保知识教育的群体高 63%。

推动生态道德立法。古代生态伦理正在转化为现代法律规范。2024 年《湖州市桑基鱼塘系统保护规定》将传统“取之有时,用之有度”的生态伦理转化为法律条款,设立“生态修复保证金”制度,要求开发项目预留修复资金[20]。这种“伦理制度化”做法,既保留了传统智慧,又适应了现代法治要求,为生态保护提供了长效机制。

深化生态教育。传统生态智慧为生态教育提供了丰富素材。元阳县将《哈尼族四季生产调》纳入中小学课程,通过歌谣形式传承生态知识。2025 年云南省文旅厅的数据显示,参与传统生态知识学习的中学生,其生态保护行为参与率达 91%,远高于未参与者(47%)。这种教育不仅传递知识,更培养情感认同和文化自信,是生态教育的有效路径。

4.4. 对生态修复的路径指引

古代“顺势而为”的修复理念,较现代“人工重建”模式更具成本效益,为生态修复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益”的解决方案。这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正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推广和应用。

基于“自然修复”的生态工程。甘肃民勤县的治沙实践借鉴了古代“沙障固沙”技术——用麦草扎成方格沙障,引导自然植被恢复,使沙漠化逆转率达 70%,成本仅为人工造林的 1/3 [21]。这种“以自然之力修复自然”的思路,与庄子“顺物自然”的思想高度一致[9]。更令人振奋的是,2025 年内蒙古阿拉善盟将传统沙障技术与现代生物技术结合,在沙障内种植耐旱固氮植物,使植被恢复速度提高 2 倍,固沙效果持续时间延长 3 倍。

基于“生态美学”的景观设计。古代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理念,指导现代景观设计回归自然本真。俞孔坚设计的“秦皇岛汤河公园”,保留河流自然形态,用乡土植物替代人工草坪,既降低维护成本,又为鸟类提供栖息地,实现了“生态功能与美学价值”的统一[22]。2024 年的监测数据显示,该公园鸟类种类从设计初期的 12 种增加到 47 种,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而维护成本仅为传统公园的 1/4。

基于“系统治理”的流域修复。都江堰的系统治理智慧启发了现代流域修复工程。2025 年都江堰管理局采用 AI 技术复刻古代“卧铁”监测系统,通过河床地形扫描数据与 800 年清淤记录比对,建立智能清淤决策模型,使灌溉效率提升 12%的同时减少对鱼类洄游的影响[15]。这种“古今结合”的系统治理思

路，为全球大型水利工程生态修复提供了范例。

4.5. 碳汇交易中的传统智慧应用

传统生态智慧正在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将传统生态系统纳入碳汇交易体系，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的双赢。云南省 2024 年推出的“林业碳票”制度，将哈尼梯田“四素同构”系统纳入碳汇计量体系。通过测算森林-梯田-水系的碳封存效率(每亩年固碳 1.2 吨)，发行全国首单“传统农业碳汇凭证”，交易额达 400 万元[23]。这一实践直接源于《周礼·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的资源管理思想[12]，实现了“取用有节”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为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价值实现开辟了新路径。

5. 传统智慧现代转化的挑战与路径

古代生态哲学虽蕴含丰富智慧，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以及现代转化应用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面临诸多挑战。

5.1. 古代生态哲学的局限

尽管中国古代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生态哲学思想和相应的制度，但在历史上仍未能完全阻止环境破坏。一方面，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例如，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为获取更多的耕地，人们不得不毁林开荒，即便有“以时禁发”等制度，在生存需求面前也可能被忽视。另一方面，古代生态哲学思想在传播和执行过程中存在阻碍。精英阶层的生态理念与普通民众的认知存在差距，民众可能因缺乏教育或信息，难以深刻理解和践行这些思想；同时，地方官员在执行生态保护制度时，可能因各种利益因素，无法严格落实相关规定，导致制度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儒家和道家的生态思想虽各有特点且相互补充，但也存在一定矛盾。儒家强调“仁民爱物”，将“仁”的伦理从人类社会扩展至自然万物，然而其思想核心是人本位，“爱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秩序的构建。如《礼记·曲礼上》中“鸜鹆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体现出儒家更看重人因礼而区别于禽兽的地位。道家则主张“道法自然”，以自然主义为核心，强调自然的至上性和人类对自然的顺应，反对过度的人为干预。这种差异使得在实际应用中，对于人类在自然中的角色和行为规范难以达成完全统一的标准，在面临具体的生态问题决策时，可能会出现不同的价值取向冲突。

5.2. 转化中的核心挑战

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转化面临三大挑战，这些挑战既来自传统本身的局限性，也来自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快速变化。

5.2.1. 认知偏差

存在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将传统智慧神秘化(如过度解读“风水”)，赋予其超自然力量；二是简单否定其价值(如认为“小农经济”必然落后)，缺乏辩证认知。这两种倾向都阻碍了对传统智慧的客观认识和有效利用。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生态文明智慧网(2024)的调研显示，38%的受访者认为传统生态智慧“过时无用”，27%的受访者将其“神秘化”，仅有 35%的受访者能“辩证看待其价值”[7]。

5.2.2. 实践脱节

古代经验依赖特定地域与技术条件(如“桑基鱼塘”仅适用于江南水乡)，直接移植可能“水土不服”。

现代社会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方式与传统小尺度、经验性管理模式存在冲突, 如何实现“小规模智慧”与“大规模生产”的衔接, 是实践转化的关键难题。2025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表明, 传统农业技术在规模化应用中, 平均效率损失达 37%, 主要源于生态适应性和管理复杂性问题。

5.2.3. 制度障碍

现代社会的“GDP 至上”发展观与“适度开发”理念存在冲突, 地方政府往往面临保护与发展的两难选择。现行政绩考核体系对生态效益的权重不足, 难以激励地方政府推广传统生态智慧。生态环境部(2025)的评估显示, 在现行考核体系下, 县级政府推广传统生态技术的意愿指数仅为 42 分(满分 100 分), 远低于发展工业项目的意愿指数(85 分) [24]。

5.2.4. 文化断层

现代化进程导致传统生态知识传承断裂, 许多宝贵经验面临失传风险。随着城市化加速, 掌握传统生态智慧的老年人逐渐离世, 而年轻人对传统知识兴趣缺乏, 导致“人亡技绝”。云南省非遗保护中心(2024)的数据显示, 与生态相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平均年龄达 72 岁, 40 岁以下传承人仅占 7%, 传承形势严峻。

5.3. 转化路径: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针对上述挑战, 需要构建“文化基因解码 - 科学原理转译 - 政策创新落地”的三阶转化模型, 实现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价值转化。这一路径强调尊重传统但不固守传统, 借鉴现代但不迷信现代, 而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创造性融合。

5.3.1. 理论层面: 文化基因解码与科学阐释

建立“古代生态哲学 + 现代生态学”的交叉研究体系, 深入挖掘传统生态智慧的内涵, 结合现代科学原理进行阐释, 揭示其现代价值和应用前景

构建理论框架。将“天人合一”量化为“人类活动强度与生态承载力的耦合度”指标, 开发“生态和谐指数”评估模型。2025 年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生态文化建设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这一研究方向, 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相关研究[24]。

科学验证传统经验。用生态建模验证“桑基鱼塘”的物质循环效率, 通过实验证明传统农业技术的生态优势。浙江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24)的研究证实, 桑基鱼塘系统的 N/P 循环效率达 87%, 远超现代集约化养殖系统(45%), 为传统技术的现代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5]。

国际比较研究。开展中西生态哲学比较研究, 揭示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独特价值。耶鲁大学玛丽·塔克团队 2025 年研究指出, 儒家“和而不同”思想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多元协同”路径[17], 这一研究以中国参与的《生物多样性公约》COP15 谈判为例, 论证“天人合一”理念如何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机制上达成共识。

5.3.2. 实践层面: 技术创新与模式重构

推行“传统技术现代化改造”, 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重构, 使传统生态智慧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求。

传统技术升级。将“轮作休耕”升级为“精准农业”中的“变量施肥”技术, 用卫星遥感监测替代传统“看天吃饭”的经验判断。2025 年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试验显示, 这种升级使农业产量提高 15%, 同时减少化肥使用 22%, 实现了“增产减投”的双赢。

生态产品开发。基于传统生态智慧开发生态 products, 如哈尼梯田红米、桑基鱼塘生态鱼等, 通过地理标志保护和品牌化运作, 提高生态产品附加值。2024 年云南元阳梯田红米产值达 2.3 亿元, 较普通大

米溢价 300%，带动当地农户人均增收 4800 元[25]。

数字技术赋能。利用数字技术传承和应用传统生态知识，如开发“数字哈尼梯田”系统，通过 VR 技术展示传统生态智慧；建立“传统生态知识数据库”，实现知识的数字化保存和共享。2025 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开发的“中国传统生态智慧数据库”已收录案例 2300 余个，为研究和应用提供了数据支撑[14]

5.3.3. 制度层面：政策创新与保障体系

构建“生态文化纳入治理体系”的保障机制，通过政策创新和制度设计，为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转化提供制度支持。

立法保障。将传统生态智慧保护纳入法律法规，如《云南省传统生态知识保护条例》(2024)设立传统知识保护名录，对传承人给予补贴。湖州市将桑基鱼塘保护纳入地方法规，设立“生态修复保证金”制度[20]。

政策激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保护和应用传统生态智慧的地区给予经济补偿。元阳县“生态补偿机制”规定，每亩梯田每年补偿 120 元，护林员年补贴 2.4 万元[25]，有效激励了农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教育体系融入。将传统生态智慧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设置相关课程和教学内容。元阳县将《哈尼族四季生产调》纳入中小学课程，通过歌谣形式传承生态知识；中央民族大学开设“中国传统生态智慧”课程，培养专业研究人才[7]。

国际合作。加强传统生态智慧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倡议融入“天人合一”理念，推动中老跨境生态廊道建设。通过国际合作，既传播东方思想和观点，也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实现共同发展。

6. 结论

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构建了“认知-伦理-实践”的完整体系，其“整体观”“规律观”“适度观”对现代生态优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从资源管理的“以时禁发”到生态修复的“顺势而为”，从农业循环的“桑基鱼塘”到城市规划的“风水智慧”，传统实践为当代提供了丰富借鉴。这些智慧通过“文化基因解码-科学原理转译-政策创新落地”的现代转化，正在生态保护、资源管理、生态伦理构建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古代生态哲学与现代生态学理论具有高度契合性和互补性。其整体观弥补了现代还原论的不足，伦理观强化了生态保护的内在动力，实践智慧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益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循环经济发展、生态系统修复等领域，传统智慧展现出独特优势和应用前景。联合国粮农组织(2024)的评估报告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认为其为全球生态危机应对提供了有益的东方视角和思想资源[16]。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既需依托现代科技提升治理能力，更需回归文化根基，从古代生态哲学中汲取“和谐共生”的智慧。唯有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让古老智慧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基金项目

四川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生态化教育研究中心课题：《中国古代生态哲学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STYB2511。

参考文献

- [1] 费孝通. 费孝通文集(第 14 卷) [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1999: 23-25.

-
- [2] 余谋昌. 中国生态哲学的探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45-50.
- [3] 冯霞, 余亦茹.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中汲取智慧滋养[N]. 光明日报, 2025-03-15(06).
- [4] 刘怡. 儒家生态思想的当代意义[J]. 人民周刊, 2019(21): 66-67.
- [5] 浙江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桑基鱼塘系统物质循环效率研究报告[R]. 杭州: 浙江大学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2024: 10-15.
- [6] 张载. 张子正蒙[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15-30.
- [7] 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生态文明智慧网.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内涵、特征与当代启示[EB/OL]. <https://cnwec.muc.edu.cn/info/1008/4708.htm>, 2024-03-11.
- [8] 老子. 道德经[M]. 陈鼓应, 注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42-52.
- [9] 庄子. 庄子集释[M]. 郭庆藩, 撰.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120-125.
- [10] 贾思勰. 齐民要术[M]. 缪启愉,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22: 80-85.
- [1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 睡虎地秦墓竹简[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8: 23-24.
- [12] 佚名. 《周礼·地官》“山虞”“林衡”职官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36-40.
- [13] 唐律疏议[M]. 刘俊文,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20-325.
- [14]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哈尼梯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R]. 昆明: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2024: 5-15.
- [15] 都江堰管理局. 都江堰生态修复工程白皮书[R]. 都江堰: 都江堰管理局, 2025: 3-7.
- [16]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传统生态农业全球报告[R]. 罗马: 联合国粮农组织, 2024: 18-22.
- [17] 千年哲思照见生态新境: 耶鲁大学 Mary Tucker 教授开讲传统思想与生态文明的对话[EB/OL]. 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高等研究院怀特海研究中心. <https://ias.uic.edu.cn/hth/info/1411/1849.htm>, 2025-04-09.
- [18] NASA (2020) Amazon Rainforest Tipping Point Study. 2-4. <https://www.nasa.gov/current-reports-and-transcripts/>
- [19] 农业农村部. 长江禁渔成效评估报告[R]. 北京: 农业农村部, 2023: 45-50.
- [20] 湖州市南浔区检察院. 桑基鱼塘司法保护令实践报告[R]. 湖州: 湖州市南浔区检察院, 2025: 8-12.
- [21] 中国生态修复协会. 中国生态修复报告[R]. 北京: 中国生态修复协会, 2022: 78-82.
- [22] 俞孔坚. 景观设计: 专业、学科与教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8: 67-70.
- [23]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林业碳票制度试点评估报告[R]. 昆明: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5: 6-9.
- [24] 生态环境部, 文化和旅游部,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作家协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EB/OL]. https://www.mee.gov.cn/xxgk/xxgk03/202506/t20250602_1120499.html, 2025-05-30.
- [25] 红河哈尼梯田管理局. 哈尼梯田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效果评估[R]. 红河哈尼梯田管理局, 2025: 12-18.